

职业教育发展评论

第1辑

ZHIYE JIAOYU FAZHAN PINGLUN

和震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职业教育发展评论

第1辑

ZHIYE JIAOYU FAZHAN PINGLUN

和震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职业教育发展评论. 第1辑 / 和震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303-17397-6

I. ①职… II. ①和… III. ①职业教育—中国—文
集 IV. ①G 71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31041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755 58800035
北师大出版社职业教育分社网 <http://zjfs.bnup.com>
电子信箱 zhi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4 mm × 260 mm

印 张：8.75

字 数：17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80 元

策划编辑：姚贵平

责任编辑：于晓晴

美术编辑：高 霞

装帧设计：高 霞

责任校对：李 莅

责任印制：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职业教育发展评论 第1辑

TVET Development Review

专家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志晶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研究员
王世斌 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教授
石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
史秋衡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朱德全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肖凤翔 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教授
张桂春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吴雪萍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孟庆国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
周志刚 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教授
赵志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俞启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徐 涵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顾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黄 炀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教授
曹 烨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
谢长法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楼世洲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翟海魂 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

主编：和 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前　　言

职业教育发展需要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同时也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动力和源泉。然而这种关系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职业教育工作者理性的实践和批判性的反思，需要善于把职业教育实践需求和问题转化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方向，需要善于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到职业教育的决策制定和实践工作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让职业教育理论成果在知识公共存在空间中更好地交流和传播，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著作和学术刊物数量已经可观，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专业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其他专业领域知名学者研究职业教育的成果也不断涌现，为职业教育研究成果，特别是职业教育、劳动力开发、成人培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搭建新的学术成果展示平台已日趋成熟。《职业教育发展评论》在研究成果的选用上突出体现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包容性和批判性。

第一，重视推介职业教育基础性研究成果。支持围绕职业教育理论领域、职业教育实践领域和职业教育政策领域的基本问题、基础知识和基本观念开展的系列研究，所呈现的研究成果普遍研究时间较长、能够系统和深入地论述某个方向的问题；坚持服务理论需要、实践需要和政策需要的研究取向，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提供最有价值的观念，不断改善中国职业教育的知识状况，进而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实践水准。

第二，体现对不同学科视野、不同研究范式、不同研究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学术成果的包容性。职业教育的实践需求往往是综合性的，实践问题的解决并不遵从学科分别；职业教育政策需求往往也是不区分学科的。站在学术的立场，无论是企业本位还是能力本位、就业导向还是人的发展导向，深入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不能片面强调职业教育的经济产业属性，也不能片面强调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既强调职业教育跨界性，也要回归职业教育的自主性；既要注重职业教育科学实验和实证研究，也要尊重职业教育哲学的、历史的研究，不同研究方法取长补短，终将所有突破，助力于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服务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不断进步。

第三，重视职业教育研究成果中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突破。批判性思维是学术

前 言

研究的重要素养和创新活动的伴侣。本书旨在呈现本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进展，传播职业教育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职业教育研究当然不可为私利驱使而将一门一派一招一式放大到无限至好，不可为一时决策之需而急功近利，不应因某一国经验之强而不顾其他，应倡导探索理论的应用边界、科学借鉴国外经验和重视本土经验提升的学术风气。在职业教育研究中处理好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关系，引领职业教育的发展。

本书系在论文主题的选择上力求全面展现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书名中“职业教育”含义等同于国际上的共识概念——“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简称 TVET)”，即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编者在此只是出于对“职业教育”中文简洁的而且已成习惯的表达方式的认可和尊重，以使所选论文能涵盖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所有研究领域。也许有一天会有更好的一个名词来取代“职业教育”，就像在美国，现在广泛使用的“生涯与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劳动力开发与教育”(Workforc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等词汇早已经取代了“职业教育”。

为了及时反映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职业教育发展评论》将于每年秋冬季出版一辑，本书为第1辑。

由于各方面原因，本书恐还存在诸多疏漏与不足，欢迎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您的任何意见或建议都将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注入一分活力与希望，并将激励编者继续前行。欢迎关心、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各界人士与编者交流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联系方式：yingdong457@163.com。

和震
于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
2013年12月

目 录

职业教育名称：一场跨越百年的争论	孟景舟(1)
中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变迁研究.....	李红卫(18)
职业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和震 郭赫男(33)
中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状及成因分析.....	潘海生 王世斌 龙德毅 周志刚(43)
中国农业职业教育的战略新选择：“双链”融合、区域集群.....	徐文新(66)
湖北省农村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研究.....	王建梁 魏体丽(85)
台湾地区技术及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及启示	张耀嵩 李继延(100)
中德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比较与思考	郑建萍(117)

注：本辑所发表的论文均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主编、专家顾问和出版社观点。

CONTENTS

Appellation of TVET: A Debate across Centuries	Meng Jingzhou (1)
Study on the Vicissitudes of Vocational Cert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Li Hongwei (18)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Teacher Standards: A Case of the USA	He Zhen, Guo Henan (33)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the TVET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n China	PanHaisheng, Wang Shibin, Long Deyi, Zhou Zhigang (43)
New Strategic Choice of Agricultural TVET in China: Double — stranded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luster	Xu Wenxin (66)
Study on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VET in Rural Areas in Hubei Province	Wang Jianliang, Wei Tili (85)
Development of TVET system in Tai Wan and Inspiration from It	Zhang Yaosong, Li Jiyan (100)
Comparison of TVET Curriculum Reform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Zheng Jianping (117)

职业教育名称：一场跨越百年的争论

孟景舟^①

摘要：在我国职业教育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职业教育是一个舶来品。职业教育名称之争，从本质上反映的是中西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语言习惯和教育制度之间的差异。结束争议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按照历史和现实、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相统一的原则，使职业教育的各种称谓回归本义，各得其所。

关键词：职业教育；名称；概念；本质

在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创立以来近百年的时间里，曾经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 20 世纪初的“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20 世纪中叶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以及 20 世纪末的“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可以说，一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历史。职业教育名称之争，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对职业教育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对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今天，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对职业教育名称之争进行系统的回顾与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智慧地面对职业教育的明天与未来。

一、我国职业教育名称之爭回顾

(一)“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

职业教育之名是一个舶来品，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耦合的产物。在我国，“职业教育”被正式提出之前，曾出现过很多如实学、农工商学、艺学、专门学校等的名称，但后来较集中地称为“实业教育”。从制度层面上看，1904 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将实业教育制度作为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一般认

^① 作者简介：孟景舟，男，河南科技学院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

为实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

在“癸卯学制”颁布的当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写道：“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就目前文献资料看，这是“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名词的最早出现。^①之后相继有许多学者使用“职业教育”这一称呼，为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第一次名称之争埋下了伏笔。

实业教育制度创立者所抱的是“教育救国”的梦想，但实业教育制度的实施并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事实上，在当时混乱的政局和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任何先进的教育也无法创造奇迹。但是，沉浸在“教育救国”迷梦中的近代先驱们，却寄希望于以一种更加完美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民生凋敝”的现实。他们纷纷把矛头指向实业教育所谓的“弊端”。1915年，黄炎培在考察美国教育时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积极宣传、提倡“美式”职业教育。1917年5月，教育界和实业界以黄炎培为代表的48人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实业教育”正式改名为“职业教育”。从此，“职业教育”成为被教育界广为认可的通用名称，并一直沿用到1949年。

在当时这次名称更迭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两者无区别。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之一蒋维乔认为“我国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不必再采美国的分科制。”^②另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黄炎培等即持这种观点。在当时，强调两者之异是主流观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以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已成为当时教育界多数人的共识，而要一事物取代另一事物，必定要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然而，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却不得不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即当时的少数派。因为既然今天把实业教育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就意味着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种教育类型。

这场争论留给今天的疑问是：既然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没有实质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名称上的更迭？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蕴含在当时的教育和文化思潮里面。我国的近代教育，先是学习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后又学习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继又学习美国。实业教育制度就是取自日本，而日本则是借鉴德国。而职业教育制度却是取自美国。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实际上是德日模式与美国模式之争。因此，发生在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的第一次名称之争实质是对不同外来文化的取舍，是学习对象国之争。

(二)“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

实业教育没有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令人无奈的是，在批判实业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职业教育”，也以同样的结局而告终。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波澜壮阔的思潮，历经曲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如前所述，

^① 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六)[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83.

^② 蒋维乔.职业教育进行之商榷[J].教育杂志，1917卷11号：1917.

职业教育的称谓却一直保持到了 1949 年。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名称之争。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时，朱德、李立三、马寅初、黄炎培等领导人，建议将发展职业教育写入《共同纲领》，但当时却以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苏联没有这类教育等理由遭到否决。《共同纲领》只在正规教育之外写入“注重技术教育”的内容。之后，便开始称“技术教育”，没有再沿用“职业教育”。^① 直到 1958 年，在刘少奇“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指导下，各地开始创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手工业中学，并把城市中的这些技术中学称为“职业中学”。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类教育被强加上资产阶级双轨制的帽子，遭到批判，职业教育的称谓随即销声匿迹。^②

由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没有争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政治完全取代了学术。因此，这场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实质是意识形态之争。

(三)“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

20 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复兴”，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出现了第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并形成了有名的赞同“职业教育”的北派和赞同“职业技术教育”的南派之分。两个名称都曾进入官方文本，并展开了长期的较量。例如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提出国家兴办“职业教育”。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把普通高等教育以外所有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其他城乡劳动者的学校和培训机构，统称职业技术教育。1991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采用“职业技术教育”。而 1996 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却采用“职业教育”，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官方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虽然对这场争论作了法律上的裁决，但却无法终止南北双方心理上的对峙和对这场争论的刻骨铭心。当年“北派”的代表高奇教授是这样回顾那场争论的：

“体系研究”的课题是华东师大的黄克孝等同志搞的，他们提出，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职业教育……另一个是技术教育……我看了觉得不妥；中央教科所的同志也不赞同。我们认为和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相对应的这个教育类型就是职业教育……至于技术教育，它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场官司打得很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要求为职业教育正名。后来一直打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那里，孙老也坚持叫职业教育。职教法出台

^① 辛浚. 需要尽快规范职业教育的名称[J]. 教育与职业, 1994(4): 5—6.

^② 孟广平. 当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21.

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①

黄炎培先生之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理事长黄大能先生对职业教育“正名”之事也非常认真，他在文章中写道：

那么，这个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可以直率地讲，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对于“职业”两字的错误认识，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中，社会不存在失业问题。所以苏联也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解放初期，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就有了这方面的争论。最后，《共同纲领》中也就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似乎我们的国家将来不存在失业和就业问题，所以只需要职业技术教育而不需要职业教育。其二，当时有一个固执成见和狭隘推测，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几十年来“霸占”了职业教育这一领域，要冲破这种“霸占”，个别教育界领导认为，若把职业教育改成职业技术教育，就能冲破这一垄断。所以不惜置职业道德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于不顾，硬塞进“技术”两字，成为“职业技术教育”。其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把“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列存在，于是有些人不顾逻辑上的不合理，把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教育名称，合并成“职业技术教育”。

上述原因造成今天仍有不少单位和不少书刊的名称仍沿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错误名称。即使国家已立了“职业教育法”，统一了称谓，一时仍转变不过来。这看来似乎只是一个名称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实质上对职业教育含义是一个歪曲。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无法认为在我国已普遍统一了认识……我不能不再度提出统一正名问题……^②

而对坚持“职业技术教育”名称的学者来说，对将“职业技术教育”正名为“职业教育”这一结果，是让他们长久不能释怀的。例如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首任司长孟广平先生生前曾提道：

我国的人才结构不合理，技术型人才比例太小，问题由来已久，至今未得到根本解决，技术教育的发展自然也不顺利。在“职业技术教育”改称“职业教育”之后带来更多的不顺利……^③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严雪怡先生也认为将“职业技术教育”更名为“职业教育”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④

就在2007年，原职教司司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金土先生还惋惜道：

① 道可道——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理论建设的话题[J]. 职业技术教育, 1999(11): 4—9.

② 黄大能. 21世纪我国仍需大力发展战略教育[J]. 教育与职业, 1999(5): 10—12.

③ 孟广平, 杨金土. 祝贺著名职教专家严雪怡先生从教五十周年暨八十华诞[J]. 机械职业教育, 1999(11): 2.

④ 严雪怡. 发展“技术教育”：20世纪的重大创举[J]. 职业技术教育, 2005(13): 15—18.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影响最大并引起此后许多歧义的名称变动是 1994 年把“职业技术教育”改称为“职业教育”。当时我还没有退休，曾经为不改名而据理力争，可是没有成功。^①

与前两次名称之争相比，这场名称之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纯粹”的名称之争，因为这次名称之争并没有带来职业教育制度或学校形式的任何变化。“职业技术教育”一词最先从何而来尚有待考证，但一般认为一是来源于苏联，另一是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教育称谓（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的中文译名。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直译成中文，应该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为照顾中文习惯，才译成了“职业技术教育”。^②

这场争论虽然以法律的庄严形式而终止，却仍留下了众多遗迹。虽然国家通过法律确定了“职业教育”这一术语的官方地位，但在学术界多采用“职业技术教育”，如中国关于职业教育的最高研究机构叫“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最高的学术团体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各类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不叫“职业学校（院）”而叫“职业技术学校（院）”；《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 号）文件中则明确提出把“各类职业学校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逐步统一规范为‘××职业技术学院’”。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出现的概率不相上下，而且在同一文本中两者还时常交替出现。由此可见，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异议一直未曾中断，而且还在不断凝聚力量。2007 年，在杨金土先生的倡议下，《职教通讯》杂志社组织职教界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和名称问题进行了新的讨论，可算是最好的例证。

二、我国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原因

职业教育名称带给我们的困惑，集中地体现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中。在论及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系时，存在着一个悖论，即“高等教育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不是职业教育”均为真命题。前一个命题的真实含义其实是“高等教育具有为职业作预备教育的性质”，后一个命题的真实含义其实是“高等教育不是技能教育”。显然，对于“高等教育是不是职业教育”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一个语言逻辑的困境。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是舶来品，这种语言逻辑的困境，实际反映的是中西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语言习惯和教育制度之间的差异。

（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

我国和西方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首先，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曾经是一

① 杨金土. 杨金土先生给本刊负责人的来信[J]. 职教通讯, 2007(6): 5—6.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第二届国际大会的建议[EB/OL]. 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1427.htm.

股很强的统治势力，教会占据着社会的最上层。整个社会被分成教会、世俗统治者和一般平民三个阶层。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教会力量退居幕后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逐渐强大，整个社会又被分成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三个阶层。这种社会结构上的“三分法”，深深影响了教育制度。我们习惯上把西方的教育制度笼统地说成是“双轨制”。实际上，就具体的学校类型而言，西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三轨制”。在宗教势力占统治地位时期，学校被分为教会、世俗统治者和一般平民服务的学校。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被分成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大学、为中层社会服务的技术学校和为下层社会服务的职业学校。这种社会和教育制度上的“三分法”，是把本来是“同一连续体”的职业教育，分裂为“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根源，并因此形成了“职业教育”的狭义化，成为与高等教育平行隔离开的概念。

而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世俗社会，宗教从来也没有成为统治力量。曾经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教，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而非宗教。在封建社会虽然也存在一个皇权的统治阶层，一方面由于人数有限；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独特的科举制，大大弱化了“皇权”和“非皇权”统治阶级的界限。科举制至少在理论上提供了“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机会，这就使得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划出一条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也使得整个社会看上去似乎是“同质的”。在近代社会以前，我国的教育就是“单轨的”。这并不是说，那时我国的教育是平等的。事实上，直到解放以前，我国的教育一直是为少数的上层社会服务的，一般劳动阶层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由于科举制的存在，使得教育至少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平等的。近代以后，我国在教育上主要是学习美国的“单轨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消灭了阶级对立，真正建构起了人人平等的同质社会。教育也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的单轨制。基于我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的“职业”和“教育”一直保持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

从文化上看，鄙视体力劳动是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这一方面，由于西方存在着比我们漫长得多的奴隶制度；另一方面，西方存在着排斥世俗职业的寄生阶级——教会集团，西方鄙薄劳动的观念要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因此，西方才会出现专为“有闲阶级”服务的自由教育哲学。而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勤俭”是被整个社会提倡的美德。社会阶层也一直是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划分，由此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对劳动的一般态度。辛亥革命后，社会出现了“崇洋”风尚。“职业”和“职业教育”作为洋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推崇——首先考虑到的是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所在。^①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劳动光荣更是成为占主导地位且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因此，从文化传统上

^① 王炳照，阎国华.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六)[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4—5.

看，我国对职业教育的轻视要远小于西方。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20世纪初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近代职业教育先驱们从开始大力推行职业教育起，就从没有把它局限在西方狭义的职业教育概念上，而一直在倡导一种“大职业教育”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无限地拓展着职业教育的疆域，并试图将高等教育囊括在内。

(二)不同的语言系统

以汉语为代表的方块文字和以英语为代表的字母文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语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西方长期严重分裂化的等级社会，造成“职业”一词具有丰富的表达形式。在职业教育领域，可以翻译为职业的英文词汇有：occupation, profession, vocation。profession 指的是所谓的学术性职业；vocation 指一般职业；而 occupation 则指所有职业的总称，包含 profession 和 vocation 的意思。例如现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两个职业分类标准，即由国际劳工局编写的《国际职业分类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和《加拿大职业分类词典》(*Canadian classification and dictionary of occupation*)，在表述职业时用的都是 occupation。^①因此，在西方，以 occupation 为出发点的“职业教育”，和以 profession 或 vocation 为出发点的职业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在我国，由于职业一词的单一性，却无法把三者区分开来。在我国说培养技术工人的教育是职业教育，而培养教师或律师的教育不是职业教育，是不可理解的。而在西方说培养教师或律师的教育不是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律师或教师的应用 profession。

由于职业教育是一个外来名词，许多概念上的混乱，往往源于翻译的问题。例如“职业技术教育”的英文是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直译应该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为照顾中文习惯，译成了“职业技术教育”。^②而按照汉语规则，“职业技术”可以作两种理解，一种是“职业和技术”，这符合译者的本意；一种是理解成偏正词组，即“职业的技术”，这就与译者的本意相去甚远。而“职业技术”在职业教育领域已成为一种常见的词汇。作为偏正词组的“职业技术”很可能来自德国文化。在研究德国职业教育专家的著述时，经常可以看到“职业人才”“职业技术”这样的名词。例如赵志群在他的著作《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就提出了“职业性技术”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看来把一个修理工的技术说成是职业技术，而把电气工程师的技术说成是非职业性技术，是让人费解的。而当我们了解了职业技术含义后就会发现，所谓的职业技术是操作性技术，而工程师的技术则是理论性技术。因此，职业技术与职业人

① 王垂芳，熊东明. 国外职业岗位培训[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131.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第二届国际大会的建议[EB/OL]. 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1427.htm.

才中的“职业”一词的真实含义，应该是操作性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职业教育”被狭义理解成培养技术工人的专有名词的结果。这就牵涉到应该如何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进行翻译的问题。例如 vocational education，我们常翻译作“职业教育”，而按照其真实含义，翻译成“技工教育”或“技能教育”应该更适合汉语的语言系统。同样，有人认为汉语的“职业教育”不能“直译”成 vocational education，而应该“意译”成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① 而对 profession 一词的翻译则有“职业”“自由职业”“学术职业”和“专业”等。相应地，professional education 一词，有人译作“职业教育”，有人译作“专业教育”。这种在翻译上的混乱直接影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的理解，同时带来了职业教育名称的种种困惑。

(三)不同的现代学校组织形式

大学是否应该进行职业教育，一直是西方高等教育哲学面临的难题。如果从中世纪大学算起，西方的高等教育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传统的欧洲大学信奉“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教育理想，把自己固守在象牙塔内，拒绝任何的实用和技术性科目。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对现代生活影响的日益扩大，大学越来越难抵抗实用主义浪潮的冲击。今天，经过美国实用主义精神改造的现代西方大学已分成两个部分：传授普通教育的大学和专业性学院。专业性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虽然具有自由教育的血统，但仍然力图在“专业”(profession)和“职业”(vocation)之间作区分，并和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保持距离。西方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学校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职业学校完全是实用主义哲学和现代科技的产物。职业学校的知识是按职业或工种划分的。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里把这种知识组织形式称为“培训职业”。因此，在西方的学校体系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不仅有量级的差别，而且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教学组织，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质的区分方面是明显的。

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和西方职业学校的历史相当。虽然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也存在着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争论，但是从我国高等教育和西方职业学校大致相当的存在时间上，就可以推断出我国的高等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接受着一种被美国实用主义精神改造过的现代高等教育观念。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无论在事实或观念上都没有西方那样一个自由教育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1949 年后，我国高等教育模式由西方转向苏联，而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模式。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把“专业”作为最基础的知识组织形式。职业学校可以说是高等学校的初级形式，高等学校也可以说是职业学校的高级阶段。两者只有量级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别。一个常用的形象说法是：“中专是大专的压缩饼干，大专是大学的压缩饼干”。当下俄罗斯的教育体制就已把高等教育纳入为职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从学校

^① 郭扬.“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 [J]. 职教通讯, 2007(1): 13—15.

组织形式而言，西方可以说高等教育不是职业教育，而我国却无法形成这样的命题。

(四)不同的职业教育生成机制

在西方，“职业教育”是一个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概念，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并不是人为地计划建立的一种职业教育模式，而是在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双元制”于19世纪末开始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才作为一种独立的概念被明确提出，而作为一种模式被确定下来是在1969年颁布《联邦职业教育法》之后。因此，在西方，“职业教育”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就是：“职业教育”中的“职业”不指所有的职业，也就是说它不将律师、医生、牧师、官吏等这样一些古典“学术性职业”包含在内，而是指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相联系的“新职业”，即所谓的“技术性职业”。这个“特定的历史事实”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使“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脱离它的字面意思成为专指“培养技术工人”的专有名词。

与此相反，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是“概念先行”——如果把西方的职业教育看成是“事实的职业教育”的话，我国的职业教育则可称为“概念职业教育”，即先主观地建构一个概念，再去构建它的实践体系。例如“初、中、高”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体系模式，就是来自于中国“有小必有大，有左必有右”这样一个凡事追求圆满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在西方，职业学校原本就是为那些接受完义务教育而不能升入大学而设置的一种学校形式，并没有严格的初、中、高之分。事实上，在我国所谓的初等的职业学校几乎一直就不存在，而近年来盛行的“高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也一直备受争议。例如职业教育专家石伟平先生就认为：“高职”，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全称也，它极可能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创造。在“高职”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出现以前，职业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界本来是“相安无事”的。而“高职”出现后，由“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四部分所组成的教育体系的内部边界开始被打破和模糊化了。职教界由于不满意“高职”的现状且不愿意把“职教”办成“断头”教育，出现了在学制上把“高职”扩展到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提出建立一个完全和普通教育相平行的体系的要求。同时，在理论上认为“教育可以分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两分法”主张也渐渐多了起来，并随之出现了“高等教育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哪一部分是职业教育、哪一部分是普通教育”以及“‘普通高等教育’是否就是‘高等普通教育’”等许多新问题。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悖论的存在，表明我国的教育体系在概念上遭遇到了障碍，甚至混乱。而这个障碍和混乱，是在我们吸收外来语言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我们只有站在如何根据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语言习惯和价值观念科学吸收、借鉴外来语言文化的高度上，才能真正揭开这个悖论的奥秘，从而以更加理智的眼光对我国教育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行新的审视。